



乾隆 (1736—1795)

君临天下六十年

李景屏 康怡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 内 容 简 介

在历史的坐标上，乾隆君临天下的六十年被定格在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乾隆六十年除夕，基本上贯穿了十八世纪的中后期。而从横断面来看，乾隆的施政方针及其特点、乾隆的治国齐家之术以及这一时期的君臣关系、君民关系以及乾隆与后妃的关系等等，则成为一个个诱人解读的热点。乾隆很有个人魅力，也留下不少风流韵事。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乾隆无疑是一位功业显赫的皇帝。他熟练地掌握几种少数民族语言，精通汉学，勤于政务，对边疆的开拓奠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的版图……

然而那时的大洋彼岸也有一位伟人，此人就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当华盛顿八年任满去当普通公民时，他所创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政体为美国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乾隆在他当政六十年即将退位的时候、在他当了3年多的太上皇驾鹤西去的时候，给他的继承人都留下了什么呢？请看本书。

本书以清代档案、乾隆朝实录、乾隆御制诗文集等史料为依据，以多年的研究为基础，再现乾隆皇帝的个人魅力与性格特点，展示乾隆的用人之道、治国之术，再现这一时期的历史真相，揭示乾隆王朝兴衰嬗变的规律，以史为鉴。本书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趣味性，雅俗共赏。



自序

在历史的坐标上，乾隆王朝被定格在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嘉庆四年正月初三（1735.10.9—1799.2.7）将近六十四年的时间内，贯穿十八世纪中后期。而从横断面来看，乾隆的施政方针及其特点、乾隆的治国齐家之术及这一时期的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的真相等等，则成为一个个诱人解读的热点。

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乾隆王朝，其政治体制的完备、经济的发展、疆域的辽阔都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盛世。无论是文景之治，还是贞观之治，其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的稳定都达不到乾隆王朝的水平。

文景之治的出现是秦末农民战争以后，经济已经凋敝到天子不能“具駟乘”的地步。为了恢复经济，西汉统治者实行“轻徭薄赋”，十五税一（即税收占1/15），减少劳役、兵役，与民休息，实行黄老的“无为而治”。

乾隆时期的社会经济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耕地十一亿亩左右，每年粮食总产量约十七亿担，人口总数接近三亿，从耕地到人口均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尽管经济如此发展，乾隆还是坚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一点可以从普免钱粮中得到印证。所谓普免钱粮，就是对全国各省的土地免征田赋、丁银。在清朝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实施

过普免钱粮。康熙五十年（1711），清王朝第一次普免全国钱粮，用三年的时间把全国所有行省的钱粮普免一次。而在乾隆统治的六十四年里，曾经五次普免全国的钱粮，三次普免全国的漕粮，累计免征白银一亿四千万两，免征粮食一千二百万担。普免钱粮在乾隆时期的多次实施，反映出经济的发展与国库储备的充足。

经济的发展在对外贸易中也充分体现出来，康雍乾时期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生丝、瓷器、茶叶在国际市场上都是非常抢手的商品。英国东印度公司收购的茶叶中，中国的就占一半以上。而当葡萄牙垄断中西贸易的时候，曾经大量购买中国的瓷器，运往欧洲。据一些学者估计，从康熙二十年左右到鸦片战争之前的一百四十多年，葡萄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用白银购买中国的茶叶、丝织品和瓷器，每年流入中国的银元有几百万两，累计约一亿七千万两。

乾隆朝的疆域较之文景时期要辽阔得多，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也比贞观更为直接、更为有效。在唐代，西藏和唐王朝只是和亲的关系，到了元代西藏成为了一个正式的行政区。直到清代，中央政府才在西藏建立起牢固的统治，西藏成为了清帝国版图当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乾隆时期提高驻藏大臣的权限使之同达赖、班禅相等，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领导，用魏源的话来说就是：“自唐以来，未有以郡县治卫藏如今日者。”至于乾隆时期对新疆的开拓，使得天山南北二百零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尽入版图，奠定了我国现代疆域的版图。在乾隆王朝统治下，清王朝的疆域接近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领土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

俄国。这样辽阔的版图，的确是文景时期、贞观时期所无法望及的。

乾隆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实力强盛，疆域辽阔，是当时亚洲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处于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空前辉煌的时代。

盛极而衰是任何一个封建盛世都难以避免的厄运，就像《红楼梦》中那首“好了歌”所表述的：“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积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此处读音为mò）了……”“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上述充满禅机的话语，实际上同辩证法是相通的，任何一种事物都要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把封建社会推向顶峰的乾隆王朝也不可能例外，其发展趋势只能是走向其相反的方面，亦即盛世的终结，以“了”来结束“好”。

早在乾隆五十七年，以给乾隆补贺八十大寿为名到中国访问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对中国进行考察之后说：“清帝国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没有向下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有纪律和安全了。”马戛尔尼作为一个已经接受近代化洗礼的殖民主义者，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封建体制所存在的弊端，这个庞大的帝国已经进入了垂暮之期，从政治到经济都已经步入到恶性循环之中。

清帝国大厦的根基已经松动、倾斜，乾隆朝的恣

乾隆

(1736—1795)

贪、乾隆君臣为保赢持泰所做的种种努力虽然可以延缓衰落的进程，却不可能改变由盛而衰的趋势，任何在封建体制内的“补天”已经无济于世。未能同国际近代化接轨的乾隆王朝，无法避免终结盛世的厄运，这不仅是乾隆王朝的悲剧，也是封建体制的悲剧。

笔者于 2002 年仲夏

# 第一章 君临天下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1735.10.18）黎明时分，太和殿前钟鼓齐鸣，跪在丹墀之下的文武群臣三跪九叩，山呼万岁；一身缟素的弘历登上皇帝的宝座，即皇帝位，以明年为乾隆元年，乾隆王朝也由此展现在大清臣民的面前……

## 一、雍正之死

乾隆帝的父亲雍正帝，在从即位到去世的十三年里的确给后世留下了太多的疑点。雍正是否参与夺嫡、其皇位的继承是否合法以及雍正是否犯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罪行就像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着这位临御十三年的皇帝。而他的去世也像当年即位一样引起种种猜测，成为一个久久令后人议论的话题。

### 1. 死因之谜

关于雍正的死因，在野史及民间传说中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雍正是被吕留良的孙女吕四贞所刺杀，就连美国人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这类相当严肃的史学著作，也认为这种传说“也未必不可信”，雍正“确实树敌太多”。

在雍正帝十三年施政中，最荒唐的莫过于对曾静、张熙反清案以及因此案而引发的对吕留良文字狱的处置。曾静派遣弟子张熙前往陕西劝说岳钟琪举兵反清，在当时属于谋反大逆，应是灭族的罪过，然而雍正却因为曾静供称：曾看过吕留良的著作、深受吕留良华夷之辨的影响而赦免曾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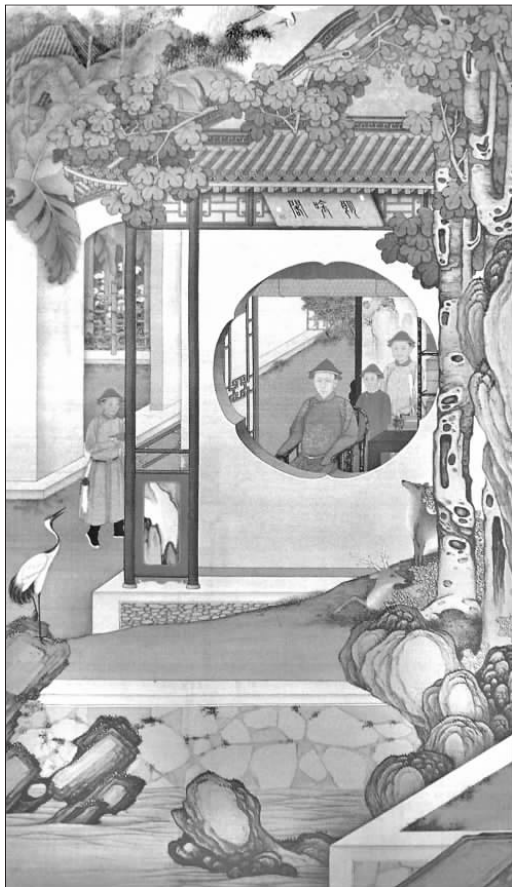
福临绘墨笔山水轴

张熙，反而对已经去世几十年的吕留良以大逆论处，吕留良及其已故的儿子吕葆中、弟子严鸿逵均被开棺戮尸，吕留良之子吕毅中及严鸿逵之弟子沈在宽被处死刑，吕、严两家的其他人均发配黑龙江宁古塔为奴。

说到底，吕留良只是学术观点问题，而曾静、张熙的谋反则是现行问题。然而由于雍正要利用曾静、张熙这两个反面典型去现身说法，宣传清朝得天下之正、颂扬雍正“圣德同天之大”以驳斥社会上流传的“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之说，赦免并释放曾、张，把打击的重点放在吕留良家族。雍正对此的解释是：曾静、张熙所攻击的只是

雍正本人，而吕留良所攻击的是雍正的父亲康熙，所以对曾、张可以从宽，对吕留良只能从严。

雍正这种颠倒轻重的处置，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读书人的强烈不满，绍兴人孙镐公开贴出揭贴为吕留良辩护，认为吕氏所著《四书讲义》详尽阐述了圣人之道，只可惜雍正日理万机无暇翻阅，如此处置吕留良只能让天下读书明理之人寒心，也会让孔孟在天之灵伤心落泪。湖南长沙也曾贴出“万姓公单”，号召在雍正八年八月十七联合行动捉拿曾静。浙江天台县生员齐周华则前往北京刑部，要求释放吕留良的子孙。而山西夏县贴出匿名揭贴，尖锐指出：“曾静可杀不杀，吕晚村无罪坐罪，真古今一大恨事。”



雍正读书像

正是由于吕留良家族成员冤沉

海底，才演绎出吕留良的孙女吕四贞手刃雍正、为惨遭杀害的亲人复仇的情节。不难看出，雍正死于非命传说之所以出笼，显然是出于对吕留良冤狱的同情。

近些年在一部相当流行的文艺作品中，在涉及雍正之死时也沿用了死于非命的观点，但在具体情节的设计上，却放弃了长期以来所流传的被吕四贞刺杀而死的传说，而是安排雍正在圆明园的杏花春馆被宫嫔刺死的结局：“高高的门槛旁便是一摊血，沿着斑斑的血渍向前，地下横陈一具女尸，双眉紧蹙，秀色如生，只嘴角微翘，泪痕满面……殿里别的物件都没有乱……雍正尚自端坐榻上僵死，御榻前淋漓斑斑点点俱是血渍，凝成血痂。雍正皇帝颈下有一刀伤……肩后有一刀伤，是刺进去的，可奇怪的是凶器匕首紧紧握在雍正自己的手中，直插心窝……眉宇间毫无惊恐愤怒之色，双唇微翕，似乎死前还在说话，惨笑的脸上双目紧闭……只见青玉案上赫然写着几个血字：不许难为此女，厚葬！”

在“不许难为此女，厚葬”的背后所隐藏的便是编造得难以相信的故事。行刺的宫嫔叫“乔引娣”，“原来是跟胤禩的”，“胤禩犯事”，雍正“收到身边，做了个低等嫔”。乔引娣长得很像一个曾救过雍正的女人“小福”，小福后来就和雍正“好上了，这事叫小福族里人知道了，用火烧死了小福”。实际上是小福的妹妹替小福死了，保住了小福及小福腹中的孩子。乔引娣就是小福与雍正之女。当小福得知自己的女儿做了雍正的嫔，自杀身亡，难以承受乱伦耻辱的乔引



雍正朝服像



郎世宁绘《平安春信图》（局部）轴  
雍正年间，弘历青少年时期

图为乾隆帝当皇子时与雍正帝品竹赏梅的情景。

娣在刺杀雍正后也饮刃而亡。

## 2. 史料揭密

据清实录等官方史书记载，雍正帝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刻（深夜11点至凌晨1点）因病在圆明园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按照雍正朝实录记载，八月“丁亥（即二十一日）上不豫，仍照常办事”，到了第二天——即二十二日，病情加重，不仅不能听政，而且令两个年长的儿子——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皇五子和亲王弘昼到身边侍奉。当天戌刻（晚上7点至9点）已现病危之兆，处于弥留之际的雍正在寝宫召见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迨至次日凌晨雍正去世，颁布大行皇帝遗诏。

据张廷玉自订年谱所记：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皇帝身体不适，“犹听政如常，廷玉每日进见”。二十二日，两更过后，张廷玉正准备就寝，内廷来人令其即刻前往圆明园，当张廷玉抵达西南门时已有三四名内侍在那里等候，“引至寝宫，始知上疾大渐，惊骇欲绝，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公丰盛额、讷亲、内大臣海望先后至，同到御榻前请安出。太医进药罔效，至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矣。”

张廷玉记载雍正生病时间比实录要早一天，在八月二十日及八月二十一日这两天，雍正坚持听政，张廷玉也每日进见，只是没有明确表明八月二十二日白天是否也包括在“每日进见”之内，但这一天深夜张廷玉因皇帝病危赶往圆明园寝宫，并同庄亲王、果亲王等人一起到病榻前请安，又目睹了太医抢救无效以及雍正的去世。张廷玉作为目击人的记载，是可信的，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另据萧爽的《永宪录》卷四所记：雍正在病危后召见了被囚禁的十四弟允禩，“先示勉励之词，后申寄托之意”，这里所说的“寄托”绝非继统之意，很可能是向同母弟托孤，但这条记载再次印证了雍正病危的事实。萧爽的《永宪录》

在乾隆十七年成书，作者本人就生活在雍乾时期，这部编年体的著作以邸抄、朝报、诏谕、奏折等为史料，客观叙述了雍正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对所涉及的人物直书功罪，弥补了官修史书的不足。《永宪录》的记载是经得起推敲的。

早在雍正八年六月，雍正就闹过一次病危，把弘历、弘昼、庄亲王、果亲王以及大学士等都召集到病榻前安排后事。实际上，从雍正七年以后，雍正就已经疾病缠身，并为此密访精通养生之道的人。有人向雍正推荐了一个生活在成都的“龚仙人”龚纶，据说此人精通医术，年已九十，身体健壮，腿脚麻利，行走如飞，八十六岁时还娶妾生子。怡亲王允祥也向皇帝推荐了一位懂得医术、擅长按摩的道士——“贾神仙”贾士芳（又名贾文儒）。

到了雍正八年五月，雍正命令各省督抚推荐“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如遇到上述人等，要“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师，朕有用处”。并明确表示对推荐之人不必心存疑虑，“即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雍正还要求各地督抚：如果听到别的省份有医术高明、深懂养生之道的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省督抚察访。”从这份密令可以看出，雍正当时已经病得不轻。

按照雍正的要求，浙江总督李卫推荐了一位懂得脉理、方剂的监生谢鹏，并向皇帝推荐了素有贾神仙之称的道士贾士芳，山西巡抚石麟推荐了一位精通岐黄之术的知县钟元辅。正是由于一些督抚向雍正推荐了一些精通医术的人，才导致贾士芳案件的发生。雍正八年七月，贾士芳被河南巡抚田文镜送到北京，开始给雍正治病。贾士芳在治病时“口诵经咒，并



宫廷画家绘《采芝图》轴  
雍正十二年24岁

画中表现出雍正帝与弘历  
父子情深。

用以手按摩之术”，治疗效果明显。雍正在给鄂尔泰的批示中，曾称赞贾士芳“调治有效”，并解释道：“朕体中不适，伊授以密咒之法，朕试行之，顿觉心神舒畅，肢体安和，朕深为喜慰。”然而到了该年九月二十五日，雍正竟以贾士芳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状况——“欲令安则安”、“欲令不安则果觉不适”、“安与不安，伊竟欲手操其柄”、“公然以妖妄之技欲施于朕前”的罪名，逮捕贾士芳，并于十月二日处死贾士芳。雍正在十月十八日再次传谕各地：“若有医学精通之人，仍著送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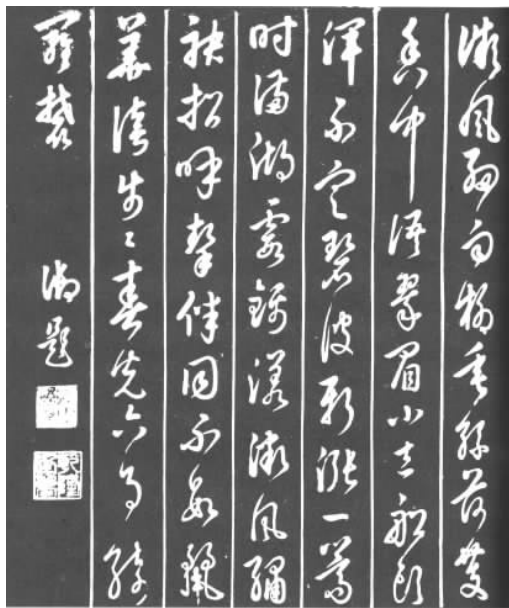
实际上雍正在求医的同时也请道士炼丹乃至服丹，在雍正帝生命的最后几年，把好几个道士养在宫中，让他们给皇帝炼丹。著名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就是通过那一时期圆明园、西苑（今北海、中南海当时称之为西苑）煤炭用量的急剧增



雍正帝行乐  
图道装像

加而推断出宫禁炼丹及雍正吃丹。吃丹所引起的铅中毒，导致雍正病情更加复杂，加速了雍正生命的进程。简言之，服丹很可能是雍正死亡的一个原因。

雍正去世仅两天，新君乾隆即将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驱逐出宫禁，为了掩饰雍正之死同炼丹有关，乾隆在谕令中特别强调雍正对于“炉火修炼之说”，心知其非，只是为了“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遣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为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



乾隆手迹

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指雍正）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逐出，各回本籍”。为了防止彼等泄露真情，乾隆还严厉训斥道：“伊等若因在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指刚刚去世的雍正）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一经访闻，定行严行拿究，立即正法。”虽然乾隆极力掩盖真相，但他在不经意间，还是透露了道士们“在内廷行走数年”的事实，诚所谓欲盖弥彰。

简言之，从官方及私人的记载中雍正并非遇刺身亡，是因病而亡，而他因病服丹也是导致病情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 二、乾隆即位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乾隆在太和殿即皇帝位，这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个经秘密立储而登上皇帝宝座的君主。

### 1. 秘密立储



年轻乾隆像

秘密立储究竟创建于何时呢？从史料来看并非像文艺作品中所说的，创建于康熙：在康熙第二次废太子胤礽后，将拟定的继承人密书于金册，存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雍正就是第一个被秘密立储的继承人。

从康熙朝实录来看，在两废太子之后，康熙不再立储，尽管他的健康每况日下，尽管臣下再三呈请册立太子以便协助皇帝处理繁重的国务，但出于对太子党的防范、对储权这一潜在威胁的忧虑，康熙在五十二年就已经流露出“不立太子”的倾向，以“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皇太子，太宗

皇帝亦未预立皇太子”作为不立太子的依据，以保证“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天下大权当统于一”。

康熙不立太子的做法，激化了储位之争，为此他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下令裁撤专门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衙门”，堵塞诸皇子向“记注官”探听皇帝立储意向的途径。起居注衙门虽然不复存在，储位之争却未偃旗息鼓，以致康熙都不得不时时提防他的儿子“兴兵构难，逼朕逊位”一类宫廷政变的发生，这位临御六十年的皇帝甚至想到自己临终前诸子“执刃争夺”的情景——弥留之际的老皇帝在乾清宫内孤苦无依，剑拔弩张的众皇子在乾清宫外骨肉相残……尽管康熙已经预感到在自己百年之后对皇位的争夺将非常激烈，但为了独尊的皇权，绝不再立太子。

康熙并未把雍正的名字胤禛密书于金册，存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据康熙朝实录记载，康熙在六十一年

十一月初七因生病从南苑回到畅春园养病，从初八到十二日病体已经稍愈，但到了十一月十三日凌晨子时，突然急转直下，出现病危，直至此时康熙才把在天坛斋所的皇四子胤禛及皇三子胤祉、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禳、皇十子胤祹、皇十二子胤禔、皇十三子胤祥等召至畅春园；并在这一天的上午，颁布由皇四子胤禛“继朕登基，即皇帝位”的谕令。此时距康熙去世只有半天的时间，用雍正的话说就是“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如果说康熙已经秘密立储，自然也就谈不上“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

雍正的即位遭到他的八弟、九弟、十弟、十四弟等人的强烈抵制，也诱发了雍正初年的骨肉相残。为了解决内部纠纷，雍正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也不得不为此而承担“煮豆燃豆萁”的恶名。雍正对于储位空虚而造成的诸王觊觎以及老皇帝晏驾后权力之争白热化，就像康熙对于储权与皇权并立一样不能容忍。为了避免新君即位后所面临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雍正在元年八月十七日建立秘密立储之制，并为此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大臣，发布谕令，申明已经采取秘密立储的做法，把所择立太子的姓名“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而在雍正的遗诏中也再次提到立储密旨：“雍正元年八月间，朕于乾清宫召诸王、满汉大臣入见，面谕以建储一事，亲书谕旨，加以密封，收藏于乾清宫最高之处，即立弘历为皇太子之旨也。”

乾隆元年七月初二，新君在秘密立皇次子永琰为皇储之后召见王公大臣，回顾了雍正当年的秘密立储以及乾隆表示要坚持这一做法的态度——雍正在“御极之元年，圣心默注朕躬，不肯宣布中外……亲书密旨，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此我皇考鉴古宜今”，“创举于一时，而朕继志述事，履行于今日”。在此乾隆已经明确指出：秘密立储并非康熙所创，而是雍正的发明，乾隆即位后把秘密立储“著



宝盒

高 41.6 厘米 方  
38.4厘米

宝盒即贮藏印玺的盒子。外层木质，内层金质，下有木几。平时外面覆以黄缎罩。

为永例”。雍正创建的秘密立储，既解决了公开立储所形成的储权，又避免了不立太子所造成的最高权力更迭中的争夺与动荡，而乾隆就是通过秘密立储而即位的第一位清代皇帝。

## 2. 宣读密旨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1735. 10. 7）深夜雍正病危，次日凌晨去世。雍正在即位之初写好的立储密旨究竟在何时宣布、这份秘旨究竟存于何处，史料中的记载并不一致。

据《清世宗实录》所载，鄂尔泰、张廷玉在二十二日戌刻以后按照雍正帝的命令宣布：“命皇四子宝亲王弘历为皇太子，即皇帝位”的谕旨，此时距离雍正去世——二十三日子时至少还有一个时辰。而立储密旨的取出及公布则是在八月二十三日寅时——弘历等人从圆明园返回乾清宫之后，而此时的弘历早已经得到雍正的授权，取出立储密旨宣读不过是履行一个程序。

然而在张廷玉的记载及有关鄂尔泰的著述中，宣布弘历即位的旨意在雍正去世之后。张廷玉在自订年谱中明确写道：在“龙驭上宾”后，张廷玉、鄂尔泰对庄亲王、果亲王及诸大臣言道：“大行皇帝因传位大事，亲书密旨，曾示我二人，



雍和宫万福阁